

暗香浮动，关于一个展览的文化传承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实习生 王若昕



■“青岛近现代名家书法遗墨展”展览现场及部分作品展示。

本版摄影 王雷

砖刻书法的青岛之缘

砖刻书法起源于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魏晋。青岛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点燃了文明之火，秦始皇一生三次东巡，立下七处刻石，其中原址位于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的琅琊台刻石举世皆知，琅琊刻石成为至今仅存的秦代标准小篆原石，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也是目前青岛地区最早的古代书法遗迹。近代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曾如此点评琅琊台石刻：“古泽渊懿，具有典谟训诰遗意……此刻一发千钧，直如麟凤。”近年来，随着砖刻书法文物的大量出土以及专家学者的重视研究，砖刻书法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并成为书法学习的经典范本和珍贵资料。

据省书协副主席、市书协主席郭强介绍，砖刻书法历史上有过几次重要阶段，第一次是先秦两汉时期，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则是晚清民国时期。秦汉时期是砖刻书法的启蒙阶段，书法五体在此时已逐渐成熟完善，砖刻书法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各种砖文书体完备，工整、写意相参，官方摹印砖文与民间写意砖文相互交融，产生了许多至今仍无法超越的经典砖刻书法作品。如著名的“君子有九思”“公羊传”砖等。而魏晋时期的砖文与同时期的书法演变一样，逐渐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篆、隶、楷三种书体合一的砖文应运而生，而且随着晋室南渡致使砖刻需求量增大，现在仍有大量数量的魏晋砖文出土。晚清民国时期则是因金石学兴起，文人爱砖者众，收藏砖刻书法并考据题跋之风在文人圈里十分盛行，包括潍坊陈介祺在内的民国文人在收藏保护古砖方面不遗余力，著述颇丰。

转至近代，辛亥革命后，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来青隐居，寄情笔墨，颐养天年。这批遗老遗少中不乏擅长书法之人，尤以王垿、吴郁生、刘廷琛和康有为等，声名遐迩，名重一时，书界时称为“三翰林一圣人”，他们为青岛留下了诸多珍贵墨宝与历史印记。1931年，中华书局印制全国名家书法集，王垿、刘廷琛、吴郁生三人赫然入榜。

青岛书法家毛智华潜心研究古砖文，经过多年时间对砖刻书法展开的研究及创作，逐渐萌生了筹建砖刻书法博物馆的想法。“在青岛筹办是家乡情怀使然，由于国内此前还没有这种方向的专业博物馆，所以一旦办成就是全国首家。”自2022年起，毛智华开始着手准备博物馆的前期立项材料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砖刻书法博物馆成立，并在青岛市书法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同时开启了举办全国砖刻书法展的计划。

承前启后的文化力量

青岛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石刻文化底蕴，琅琊刻石、天柱山摩崖石刻、大泽山石刻、崂山刻石碑记等遗存甚多，于文案典籍中成篇、匠心巧手中雕琢、岁月风霜中打磨，石刻文化已然成为自然与人文的绝佳桥梁，串联起过去与当下，为青岛增添了人文历史的深厚魅力。

石刻与砖刻，在材质上同样是“老而弥坚”，在字体上同样是古朴稚拙，无疑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秦风汉韵”首届全国砖刻书法展，填补了砖刻书法领域全国性展览的空白，为书法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载体和视角来接近书法和篆刻艺术。秦风汉韵与金石之气，力透纸背铿锵而

出，化作一阵文化清风令岛城市民与书法爱好者如痴如醉。

“本次展览的多数作品没有在技术上纠结，而更多的是在书体上、刀法上，金石气息和秦汉古意上下工夫。使得作品有生气，耐看不俗，犹如一股清流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毛智华向记者表示，目前行业内的很多作品，宛如机器批量打印制作，在技术层面上无可指摘，却失去了书法艺术的精气神，可谓是迷失了书法的本来面目。

当代的砖刻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独具美感，离不开它的历史渊源，即秦汉时期的砖文，其文字往往顺应砖形，在形体与结构上作出适应性变化，展现出独特的装饰美感，既规范严谨又质朴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砖文的制作与书写者多为基层工匠，他们的文化艺术水平有限，书写较为自由，较少受到传统规矩的束缚。因此，他们在书体设计上能够融入个人审美，使得所书刻的文字充满一种自然质朴的趣味。这种差异正是民间工匠与官方书法的区别所在。尽管这些砖文没有官方书法的规范格式和程式化审美，但正是这种原始、真实的文字形态，更能让人们从中窥见汉代民间书法的真实面貌。

著名书法家崔志强此前曾对砖刻书法艺术有如此的评价：“在古砖上书丹、凿刻、拓片、题跋，是古今书法融合创新的典范，将两千年前的秦风汉韵巧妙地融入进砖刻作品中，既是对艺术模式化的反叛，也是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为中国书法提供的新范式

古典与现代相融，是本次砖刻书法展评审阶段尤为看重的一点，砖刻书法作者冷梦雪的作品，是唯一入选全国第12届刻字展的砖刻书法作品，在作品中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高度统一。冷梦雪采用的是北魏造像题记的形式。即以数块古砖以龙门造像题记形式，用现代的内容和书刻再现了似碑似砖的创作。可能是木刻作品中缺少此类题记形式，或书法黑白两色的原始感觉和金石气息，而砖刻作为其他材料恰好填补了木刻之缺憾而入选。这种创新，让其在一众木刻作品中脱颖而出。

“这也给后来参加全国刻字展的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首先在题材上不要与木刻重叠或相似，要利用古砖独有的金石气息和残泐特色，完成直线超越。要在书法年代感、书体过渡、金石气息等方面多动脑筋，而非是在制作和纹饰色彩上与木刻去争一席之地。”郭强认为，只有那些既有传统又有新意，既古典又现代，符合传统审美的作品才能打动评委并入选。比如有些作品以金文大篆入砖则显得不伦不类，或者图案纹饰多于文字感觉本末倒置，或者书法低俗类似江湖书法，不能入选也在意料之中。不论怎样，首次全国砖刻书法展览能收到如此众多和高水平的稿件，为展览的成功举办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今后的砖刻书法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追溯至上世纪1981年的首届全国书法展，当时的作品今天来看，整体水平虽然相对落后，但历史沧桑感和时代气息十分浓厚。假如再过去若干年，来看首届全国砖刻书法展入展作品，道理亦然。如《兰亭序》中所言“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其历史意义和开拓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它将两千年前的传统书法遗存挖掘并传承，为中国书法增加了新的载体和形式，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新的学习范本和方法，也是继五种书体和篆刻、刻字之外又一种崭新的创作模式。

书法是古老的，一如传统文化的厚重悠长。书法又是年轻的，因为有一代代人的传承赓续和创新延展，于是便拥有了春风般的风华正茂。

刘文泉： 保持热爱 不负丹青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实习生 王若昕



■刘文泉

每有客人拜访，刘文泉都是亲自接送至门口，人情练达；每每忆起往事，或者谈及对艺术的理解，刘文泉依然洞若观火，才思飞扬。按照民间的算法，1935年出生的刘文泉今年已是90岁高龄。虽然已是鲐背之年，但他每天仍然笔耕不辍，潇洒于山水画创作。甚至，他的治印刀也一直没有停歇，方寸世界流淌出大千世界的气象无垠。

刘文泉曾任青岛画院院长，青岛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为中国美协会员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奋勇向前》这幅作品，是他绘画道路的重要起点。这幅创作于1957年春天的画作，既是他第一幅入选青岛市级美术展览的作品，也是他艺术人生的缘起。“1957年下半年，市文联将这幅作品送到济南参加山东省的美展，又入选了。后来，这幅作品被选送到1959年全国第二届美展，获得全国优秀奖。”刘文泉回忆说。多年后，《奋勇向前》在新世纪又被选入《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刻痕在共和国画史上。这是后话。

1960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历时22天，山东代表团有47人，其中最年轻的是时年25岁的刘文泉。文代会期间，当时的中国美协代主席华君武从会议座次表查到了他，特地走过来问了一句：“你是山东来的刘文泉？”那时，刘文泉方知，他来开文代会，是中国美协“钦点”的。这一年，他从一名工厂的青工，转身成为青岛文联所属的《海鸥》文学月刊的美术编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滔滔，1980年青岛画院建院，由著名花鸟画家隋易夫先生任首任院长，刘文泉任副院长，负责具体建院工作的实施。在筹建青岛画院过程中，刘文泉跑选址，跑手续，跑融资，跑施工，历时数年，配合隋易夫先生，终于在湛山东侧十一亩山地上，建成了青岛画院，青岛的一众艺术家们从此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改革开放后，离开了“命题作文”的刘文泉回到自己擅长的山水画领域，其佳作多是跋山涉水，对景写生而成，没有拘泥造物的琐碎之笔，多是以景写情，满卷充溢着情景交融的浩然之气。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青岛外事活动，都是选用刘文泉的作品当伴手礼。他的山水画，一度是“印象青岛”和“印象中国”的符号。

齐白石曾言：“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复写意；写意而复写生，自能形神俱见。”刘文泉把面对自然的写生，当作自己观察自然、理解自然、表现自然的一个风格。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技法在描绘自然的过程中经历了质的变化。这些技法不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磅礴壮丽的大自然紧密相连。在亲近自然的写生中，传统技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生命，使得刘文泉在继承中国水墨画传统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一种禀赋凛然的创新精神。这正是刘文泉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其成功的关键。他通过传统技法与自然写生的结合，不仅展现了中国水墨画的深厚底蕴，更赋予了这一古老艺术形式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90岁高龄的刘文泉，依然精神矍铄，自信满满，每天作画治印，乐此不疲，他的书房展板上可以看到多幅近期创作的得意之作。他用中国传统水墨画来表现写意山水，早足声名的名山大川和大好河山早已化作胸中丘壑，随时纵笔即自成一番山水气象。

除绘画艺术外，刘文泉还是一位著名的篆刻家，在这一领域多有建树。他师承潍县陈介祺后人陈寿荣先生，并得其真传，篆刻功力深厚扎实，有《刘文泉印痕》刊行于世。翰墨可以传情，为朋友治印也可以成为弥足珍贵的纪念。

几年前，刘文泉为同为“80后”的画家陈辛一治印，其中一方以二人相识并相知的历程为题材，刻印于边款之上。两位先生一个甲子的惺惺相惜，缘于20世纪50年代时两人关于艺术的鸿雁传书，信件频繁往来于青岛与大连之间。20世纪80年代后，陈辛一由大连调至青岛工作，他们的艺术交流自此愈加密切。陈辛一说，此印治成以后，他的作品所用印章都是这几方印。如是，即友情的最好印证。

在很多青岛艺术界人士的记忆里，刘文泉是个非常热心肠的人。一方面，他关爱和提携了很多后辈，成为大家艺术历程上温暖的印迹。他实实在在帮助了一些老画家的艺术，甚至是住房和养老这样的琐事；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很多艺术活动，邀约了大量国家级的艺术家到青岛交流和举办讲座，至今依旧余音绕梁。

时至今日，若与刘文泉闲聊，每当开启一个话题，他都能发散思维，貌似离题千里，旁征博引，而到最后，那句话又总是回到主题上去。策展人史希强说，和刘文泉先生聊天，堪称是一种享受。关于青岛，乃至山东文化圈的史实，他知之甚多，甚至是其中不少重大时刻的亲历者。“我曾赞

称刘先生是青岛百年史上的‘文化活化石’，他断然拒绝，连道：‘不可造次，不可造次！’史希强表示，刘文泉先生的格局和格调令后辈高山仰止又心生无限敬意。